

文史资料选辑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第一六一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英
實業
材料
選集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六二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61 辑 /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34 - 3677 - 2

I. ①文… II. ①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 IV. ①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6174 号

责任编辑: 殷 旭

封面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3.5 字数: 19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	陈福今				
副主任	卞晋平	毛福民	计佑铭	冯骥才	范钦臣
	郑欣淼	钟起煌	施子清	桑结加	崔占福
	梁 华	陈光林	周国富		
委 员	王兴东	王晓秋	石 峰	刘兰芳	李兴山
	李国强	李景瑞	余 辉	沈 悌	张 皎
	张 健	张华祝	张廷皓	陈 力	陈 醉
	林 野	黄小同	曹幸穗	曹鸿鸣	戚发轫
	董良翠	滕矢初	陈爱菲	张燕妮	许水涛
	王合忠				

口述历史

1 周恩来邓颖超做统战工作见闻

◎赵 炜

18 一生耕耘谱心曲

◎吴祖强

委员园地

29 亲历香港回归谈判

◎陈佐洱

72 探寻汉长安城未央宫宫殿遗址

◎刘庆柱

往事追忆

80 对北平解放的一点回忆

◎王大明

86 孙中山与故宫博物院

◎单士元

91 伯父姚一廷与卫立煌将军在抗战期间的往事

◎姚景强

104 随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中央银行

◎周耀瑾

人物春秋

110 忆吴晗

◎苏双碧

116 忆亲爱的弟弟穆青

◎穆静涵

131 缅怀爱国爱教的贡唐仓活佛

◎赵祥明

耆年自述

139 世纪的回眸

◎杨之英

史海钩沉

171 《孙、黄遗札密詮》的由来

◎黄伟民

175 忆首台国产微机的研制过程

◎林勋准

181 念光屯的“越南干部训练班”

◎苏大新

文苑艺林

186 “芭蕾外交”促进中日建交

◎朱 实

195 难忘“哈夏”情缘

◎关 丕

周恩来邓颖超做统战工作见闻

◎赵 炜*

我是1951年抗美援朝时参军的，1954年转业后到国务院机要处工作。10个月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需要调人，机要处推荐了我，所以从1955年3月起我就调到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

我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了37年，前后为周总理服务21年，先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10年，1965年12月到邓颖超大姐身边。不久“文革”开始，周总理的值班室人少，邓大姐在全国妇联已经“靠边站”，两位老人家商量，叫我回周总理值班室帮助工作，同时也要为邓大姐工作，一直到周总理去世。我为邓大姐服务算来也有27年。

我担任过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之后担任8年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10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让我来谈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的见闻，应该是义不容辞的。那时候不可以自己做日记的，现在年龄大了，全凭脑子回忆，有的事情可能不完整，但这些都是我的亲见、亲历。

* 赵炜，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等职。



倡导和推动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周恩来总理连续兼任了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大姐是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源头从哪儿来？就是在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当全国政协主席时召开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在那个会上周总理讲，新中国成立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例也是很有价值的。比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怎么产生、发展和衰亡的。他说，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形态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去世了，但事例可以作为文史资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了。人们都赞扬我国古代的文化，其中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等。文史资料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希望在座的政协委员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对社会有所贡献。

周总理还说，对工作负担较重的委员，他将通知各部门加以照顾，委员自己也可以提出要求。对年老工作较少的，希望将各自的一技之长，或者掌握的一部分历史文化遗产贡献出来。可以带徒弟，写军事史、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和其他一些行业的情况，政治史、经济史等等。他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要成立收集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组。

当年7月2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周总理对文史委的工作布置得非常详细、具体，得到了很多老人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不久委员会办公室就陆续收到了很多篇回忆资料，并编辑出版了

《文史资料选辑》。周总理很喜欢阅读《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章。

1961年2月19日，周总理出席全国政协召集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充分肯定了近两年文史资料工作的成



作者担任邓颖超秘书，协助邓颖超工作。

绩，勉励他们今后继续写出更多的文史资料。这是事隔两年以后，周总理亲自参加会议鼓励委员们撰写文史资料。所以说，周总理在推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上，起到了倡导和开创性的重要作用。

1983年，邓颖超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和周总理一样重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六届一次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她就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文史资料工作会议，要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地方政协文史工作部门，在3个月内总结一下工作，将总结报告提交第二次常委会讨论。

在邓颖超主席的倡议下，1983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邓颖超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出，政协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它跟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它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从形式上、从工作内容上看，这是属于静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



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的工作都可以包括进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

当时，邓大姐还讲，文史资料要重视真实性，不要凭印象。比方，请一个老人讲什么事情，必须讲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而不能讲好像是什么，印象如何，那样不行，一定要真实。这样的文史资料，才能留下历史，留给后人有用的东西，贡献给社会，起到教育下一代的作用。应当说，周总理倡导了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邓大姐推动了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使“文革”中停顿的文史资料工作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邓大姐不仅参加了这次会议，还看了会议的全部简报，并认真提出自己的意见。

此次会议提出文史资料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方针。全国政协非常重视文史工作，六届政协第三次常委会通过了此次会议报送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文件。

1986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邓大姐因为患病没能出席。但是，她专门写一封贺信表示祝贺。她在贺信里说，社会需要你们，你们需要社会，你们要在工作中多交朋友，尤其是要多交新朋友，勉励文史工作者继续做好工作。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主席关于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提法、意见，至今都有现实指导意义。

与各界人士交往如春风暖人心

周总理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之一，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其中一项就是统一战线工作。这是他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代领导人亲自制定的，周总理既是制定者，也是执行者。他曾经说过，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他说，这个问题要抽象地讲起来比较容易理解，但是，

一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很多同志就认为统战工作就是统战部的事，就把统战工作缩小到上层领导、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方面的范围了。他说，这一点也不错，但是，统战工作是以代表性人物作为对象的，因为他们有群众。我们要通过他们去做群众的工作，这样我们党的工作任务就好贯彻执行。周总理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

邓颖超同志也一直把统战工作作为自己的责任，融会到平时的工作当中、同各界人士的交往当中。比如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在重庆那一阶段，跟各界上层人士、党外人士，包括国民党的人物，接触比较频繁，工作任务比较繁重，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结交了很多朋友，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包括一些知名人士，真心与他们交朋友。

我在周恩来总理、邓颖超主席身边工作那么多年，知道他们结交的朋友很广泛，各个方面、各行各业、国内国外，简直太多太多了。周总理和邓大姐平易近人，愿意多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有很多朋友愿意跟他们交谈，有什么问题都会找他们谈。他们了解到问题应该解决，马上就给解决。尤其是对历史人物，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有贡献的人，即使他本人已经不在了，他的妻子、儿女还在，也不能忽视。因为要看到人家对我们党的贡献，不能人一走，茶就凉。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主席身上，既有原则性，也很有亲情。

他们在各行各业的朋友，真是数不胜数，我只能挑重点的说一说。比如说，“五四”时期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搞觉悟社的人有的也住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前，逢星期天，周总理有空就和邓大姐一起去看望他的同学、在中国银行任职的潘世伦。潘世伦夫妇俩都是觉悟社的人。周总理和邓大姐还有一些老朋友，他们也是亲自到家拜访。这是他们俩一贯的作风，所以到现在（采访时为2010年）周总理去世34年了，邓大姐去世18年了，人们还常常怀念他们，纪念他们，就是因为人们爱戴他们、想念他们。

与宋庆龄的交往

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她去世前是国家名誉主席，在临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同志跟周总理和邓大姐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在广州办黄埔军校时认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孙中山先生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邓大姐讲过，她是怎么结识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去世后，组织上派她去送灵的等等。他们之间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宋庆龄同志跟周总理和邓大姐讲，不要叫我孙夫人，也不要叫副委员长，就叫庆龄同志。抗战时期我们党和军队物资条件十分困难，缺医少药，宋庆龄同志想尽办法从香港弄到医疗设备和药品运到解放区。她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党对她从事的事业也是一直支持的，她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会、中国福利基金会、幼儿园等等一系列事情，我们党都支持她。具体的就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直接支持她、帮助她，有什么困难就立即解决。

我们党对宋庆龄很尊重。比如说，她在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党的重要事情都向她通报，让她知道我们的工作。还有就是参加外事活动，她陪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过好多国家，就是因为她的地位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很重要。向她传达事情的时候，中央多是派周总理去，有时候周总理忙，邓大姐就去看她。宋庆龄同志有一个特点，她一般见客是在楼下，她的楼上是不让别人上去的。周总理去的时候，就在楼下会见。后来邓大姐去的时候，好多次被请到楼上，我陪同去，只能在楼下等着。后来宋庆龄同志病重的时候，邓大姐去看她，必须得到楼上，我也可以跟着上去了。

宋庆龄同志很重视和周总理、邓大姐之间的友谊，那种友谊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她知道邓大姐爱吃上海的五香豆，每次从上海回来都带五香豆给邓大姐。后来，邓大姐说我已经老了，牙咬不动了，你别带了，才终止。周总理和邓大姐有国外朋友送的什么水果，也送给她。我记得邓大

姐有一次出访回来，带回的紫罗兰花特别漂亮，就送给宋庆龄同志了。据宋庆龄同志的秘书讲，她不喜欢假花，可是邓大姐送的这个花，她非常喜欢，一直摆在她客厅的孙中山先生的像下面。这件事象征着吉祥、友谊，从她们交往的细节可以看出她们之间的友谊。每年春节邓大姐和宋庆龄都互寄贺年片。记得有一年，宋庆龄同志也给我写了一个贺年片，还写上“赵炜同志”，令我十分感动。

“文革”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开出要保护的老同志名单，第一个保护对象就是宋庆龄同志，不许北京、上海的红卫兵冲击她，并亲自跟红卫兵谈话。“文革”开始，上海的红卫兵把她家的墓地给毁了，上海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此事。我们接到这个电话，马上报告周总理，他指示上海方面，必须立即修复，然后拍下照片。当时，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担任宋庆龄的秘书，还有一个秘书罗淑章大姐，是一直跟宋庆龄在一起的，由她们来传递信息。上海方面很快办妥，然后托人把照片转来，再通过廖梦醒报送宋庆龄同志，宋庆龄看了很是欣慰。

周总理病重住院的时候，我曾经给宋庆龄同志的杜秘书打过电话。记得他们院里养了一群鸽子，宋庆龄同志攒一些鸽子蛋，都要送给周总理吃。周总理病重时的 1975 年冬天，北京天气很冷，买不到鸽子蛋，到郊区去收购都买不来。后来，我就跟邓大姐说，我去给杜秘书打个电话，他们院子养了 200 多只鸽子。



1962 年，周恩来与宋庆龄在一起。

邓大姐说，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首先你要问宋庆龄同志吃不吃，如果她吃，咱一个都不能要。我给杜秘书打电话，杜秘书说，首长早就不吃鸽子蛋了，没问题，我一定给攒。我说你报告一下首长，然后你再给我们送来。她就跟宋庆龄同志说了。

当时，宋庆龄同志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老人家听到报告后很认真，天天督促秘书看着鸽子有没有下蛋。冬天，那 200 来只鸽子，能下几个蛋啊？她攒五六个就送一趟，攒四五个就送一趟。所以，周总理住院后期吃的鸽子蛋，都是从她那儿来的。宋庆龄同志觉得当时能给周总理做点事，非常高兴，特别愿意为邓大姐排忧解难。能够为总理解决鸽子蛋的问题，她感到挺欣慰的。

1981 年宋庆龄同志生病的时候，邓大姐三天两头代表党中央去看望。她去世后送她的骨灰到上海，党中央也是让邓大姐牵头去的。我记得，有乌兰夫同志、陈慕华同志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到上海。对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处理，邓大姐和廖承志同志亲自在那儿落实。

与巴金的交往

再讲邓大姐和巴金的友谊。1985 年 3 月 23 日，巴金从上海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大姐知道巴金来了，特别高兴。邓大姐说：“我一定得去看一看巴金同志，因为多年没见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到北京来了。”后来一打听，他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24 日，邓大姐就去看巴金同志了。当时两位老人都是八旬以上年纪，很多年没见了。巴金是由女儿陪着来的，邓大姐见了以后特别高兴，问他的身体情况，知道他的腿不好，就让他多加注意。邓大姐还说，欢迎他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的会，希望他对全国政协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巴金特别感谢邓大姐来看他。邓大姐觉得对这位老人应该是更加关心和照顾，应该上门去拜访，去看望他。

1984 年春节的时候，邓大姐托去上海的曹禺同志带一束鲜花去慰问巴

金，因为当时他住院。还有1984年11月25日是巴金的生日，邓大姐又委托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买一个蛋糕送给他，祝贺他的生日。巴金在上海生病住院、过生日，邓大姐都要嘱托有关组织照顾好他。邓大姐一直很关心、很尊敬巴金同志，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友谊。

与赵朴初的交往

赵朴初先生是佛教界的代表人士，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位老人家跟周总理、邓大姐也是几十年的交往了。他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件事情是永生难忘的。1949年秋天，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有一天宴请，我收到一张请柬。我想，咱是一个佛教徒，常年吃素。这次会议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宴会，怎么能照顾到我呢？要想照顾到每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万万没想到，当拿着请柬走到宴会厅门口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赵朴初先生，给您准备了素菜，请您在这边坐。”当时这一句话，我既吃惊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周总理管那么多大事，这么具体的事他也惦记着，叫人永生难忘。赵朴老一见到我，就要讲这个故事，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他是永生难忘周总理多么细致、多么关心人。

周总理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赵朴老写过诗表达怀念之情。后来的交往比较多，他经常去看邓大姐，有时候他让家里人给邓大姐做素什锦，就是豆制品卷的素食，特别好吃。邓大姐只要有外国人送来的水果，必定分送给赵朴老。



邓颖超与屈武（左）、赵朴初（中）亲切交谈。